



ZHONGGUO
ZANGDI KAOGU



中国藏地考古

六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天地出版社

win share 文轩

天地出版社

ISBN 978-7-5455-1019-5



定价：6800.00元
(全十册)

中国藏地考古

(第六册)

艺术考古编·西藏壁画艺术





目 录

西藏寺院壁画艺术·····	1764
Fresco Art of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ibet ·····	1775
西藏壁画艺术图版·····	1791
西藏西部壁画——古格王国的艺术（1000—1500年）·····	2105
东嘎·皮央的石窟与壁画艺术·····	2119
夏鲁寺的建筑与壁画·····	2133
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的降魔变与西域美术的比较研究·····	2149
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	2156
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几种艺术风格的分析——兼论西藏西部石窟壁画艺术三个主要的 发展阶段·····	2166





目 录

西藏寺院壁画艺术·····	1764
Fresco Art of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ibet ·····	1775
西藏壁画艺术图版·····	1791
西藏西部壁画——古格王国的艺术（1000—1500年）·····	2105
东嘎·皮央的石窟与壁画艺术·····	2119
夏鲁寺的建筑与壁画·····	2133
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的降魔变与西域美术的比较研究·····	2149
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	2156
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几种艺术风格的分析——兼论西藏西部石窟壁画艺术三个主要的 发展阶段·····	2166



中国藏地考古

(第六册)

艺术考古编·西藏壁画艺术



HONGGUO ZANGDI KAOG



西藏寺院壁画艺术

霍 巍（四川大学）

索朗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

西藏，是藏族历史文化的发源地。藏族的绘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宗教绘画开始兴起和发展，逐渐形成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其中又以寺院壁画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

西藏绘画艺术的起源甚早，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已经注意到在器物的不同部位装饰以不同的纹饰，包括刻画或压印的平行线、三角纹、方格以及菱形等几何形的图案，讲究图案的排列和对称。不仅如此，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器，说明人们还能够运用色彩绘制图案。位于西藏腹心地带的拉萨河谷曲贡遗址，除在大量的器物上发现“涂彩”的痕迹之外，还在一些陶器的局部发现重菱纹、锥刺纹、弦纹以及压印纹、平行几何纹、人字纹、波折纹等多种装饰性纹饰。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纹饰采用一种可以称之为“磨花工艺”的局部磨光技术来加以表现，以光面和糙面的对比来突出纹样的结构，已经具有成熟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进入早期金属时代之后，西藏高原的许多地区都发现有古代的岩画遗存。这些岩画或采用坚硬的工具雕刻在崖面、崖阴、天然石块上，或采用红色的矿物质颜料绘涂于这些场所。岩画的内容题材已相当广泛，包括狩猎、放牧、战争与演武、自然与神灵崇拜、动物植物以及器物、天象等等，在技法上已经十分娴熟地运用单线勾勒、剪影式造型等方式来表现形体、突出特征。这一切均表明，早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西藏原始的、土著的早期绘画艺术已经有着漫长而缓慢的发展历史，为以后宗教绘画艺术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初步的基础。

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按照西藏佛教史籍的记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说是在松赞干布以前五辈，即拉托托日聂赞时期，约在5世纪。但是，大规模的、正式的传入，一般认为应该是从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时期算起。西藏寺院壁画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应与佛教的传



入和发展同步。

松赞干布时期（617—650），可能是寺院壁画艺术的兴起阶段。这个时期，由于松赞干布与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两公主的进藏，分别由尼泊尔和中原内地带去大量的佛教经典、营造工艺以及大批的匠师。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寺庙开始在吐蕃兴建。除著名的拉萨大昭寺、小昭寺外，当时在吐蕃中部还建了四座大寺称为“四如寺”，四如寺之外建立了“四厌胜寺”，四厌胜寺之外又建立了四“再厌胜寺”，其目的在于“制服藏地鬼怪，镇伏四方”¹。为了装饰这些寺庙，需要大批的工匠绘制壁画，显然会使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赢得一个很好的发展时机。据称大昭寺内当时便绘有八佛子、无量光佛、救八难度母、观世音、七世间佛、五种姓佛以及吉祥天女等壁画，这些壁画所绘制的神灵都是松赞干布本人所敬奉的神灵²。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壁画的内容题材上，已经反映出这个时期吐蕃王室所接受的佛教中，开始出现了密宗的迹象，其中已不乏密宗的神像，如救八难度母、吉祥天女等。

松赞干布去世之后两代赞普因忙于内部平乱和对外征战，无力顾及发展佛教。直到8世纪中叶，赤德祖赞（704—755在位）死后，其子赤松德赞（755—797在位）即位之后，随着佛教势力的兴盛，壁画艺术方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在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坚（即赤祖德赞，815—838在位）时期，由于吐蕃王室大力扶植佛教，广建佛寺，寺院壁画也相应地受到重视。赤松德赞迎请印度著名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进藏，兴建了西藏佛教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据藏族史籍《拔协》记载，当时的桑耶寺三层主殿均绘制有壁画，内容有按《白莲华经》、《宝顶咒》、《宝云经》、《出离经》等经典绘制的传承画，甬道上绘有千佛贤劫出世图、恶趣六十劫、大威怖劫万佛出世图、八先明圣者像、龙王阿难达乌里格等宗教壁画，主殿周围的四大洲、十二小洲也各绘有壁画³。

遗憾的是，吐蕃时期的佛寺，到了吐蕃王朝末期，由于朗达玛的灭佛，遭受到很大的破坏。史载这次禁佛运动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停建、封闭佛寺，破坏寺庙的设施，均是主要的手段。桑耶寺、大昭寺等著名寺院遭到封闭，小昭寺则变成了牛圈，许多寺庙寺内的壁画在被抹涂掉之后，又在上面画上僧人饮酒作乐的图画⁴。今天，我们只能从大昭寺、桑耶寺所残存的早期壁画中去感受吐蕃时期壁画艺术的神韵。

1 第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2年3月，第36～38页。

2 参见扎雅：《西藏宗教艺术》，谢继胜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3 拔·塞囊：《拔协》，佟锦华、黄布凡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34～36页。

4 参见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灭亡，西藏高原陷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由于朗达玛的灭佛，这个阶段佛教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几乎被禁绝，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直到10世纪的后半期，佛教复兴势力分别从多康和阿里进入到卫藏（史称“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西藏佛教才重新得以振兴，历史上称其为“后弘期佛教”。

后弘期佛教与吐蕃时期佛教（史称“前弘期佛教”）既存在着继承关系，同时在形式和内容上又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佛教和本教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融合，终于最终降伏了本教，并吸收本教色彩形成西藏佛教——即所谓“喇嘛教”或“藏传佛教”。从11世纪中叶开始，西藏佛教开始进入各个教派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先后形成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囊派、觉宇派，直到15世纪形成影响最为深远的格鲁派。

这个阶段，由于佛教势力的兴盛，带来了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空前的繁荣。这个时期的寺院壁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由于西藏佛教后弘期初期正是印度波罗王朝大崇密教，特别是无上瑜伽密时期，因此，西藏各个教派都侧重密宗教法，在寺院壁画中出现了大量密教的图像。尤其是密教中盛行“明妃崇拜”（Saivife Cult），认为神灵的活力是以女性的形体、神的明妃来表现的，并由神灵与他的明妃性的结合来象征全部或部分的神力，从而将女性神引入了大乘佛教的万神殿。各种度母、空行母和女性神魔十分盛行。

其二，是各个教派的壁画艺术也出现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如萨迦派俗称“花教”，其寺院围墙多涂红、白、蓝三色条纹，这三种色彩也常见于萨迦派的寺院壁画。现存的萨迦南寺、夏鲁寺等处壁画艺术，就具有萨迦艺术风格。元代授命萨迦王朝管理西藏事务，萨迦为元朝敕封的十三万户之首，与元关系密切。忽必烈帝师八思巴曾请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来西藏建塔造像，在绘制寺院壁画方面，阿尼哥大概受到后期印度密教作风的影响，萨迦派壁画中的后期印度密教艺术风格，很可能与阿尼哥有关。而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古格王朝寺院壁画，由于地处与新疆、克什米尔、印度等中亚、南亚佛教艺术的交接地带，古格王国僧人曾到克什米尔（迦湿弥罗）学法，迎请孟加拉僧人阿底峡到古格传教，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地区佛教艺术的影响。作为格鲁派主寺的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以及拉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的壁画，则具有画风严谨、技法规范和注重描述历史传统题材等特点，因描绘藏密题材而独具一格。

其三，是各个地区逐渐形成的民间画派开始对寺院壁画产生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如：（1）门塘画派（又称为勉拉顿珠嘉措画派），因其祖师顿珠嘉措出身于山南洛札门塘地区而得名。其画风雍容华贵，富丽堂皇，造型严谨，善于沥粉堆金，用笔多侧锋兰叶描或蚯蚓描，技法丰富全面；（2）噶玛噶画派（又称为噶尔画派），其祖师朱古拉喀扎西是出生于亚堆地方的噶玛派



活佛。此画派主要传播于西藏东部地区，善画花草树木、山石瀑布，神佛肖像也常以自然风景为背景，线条多用刚劲流畅的铁线描，设色雅淡，勾勒人物的衣纹细腻繁密，人物形象神态生动；

（3）歧乌热画派（又称为“鸟派”），因其祖师朱古歧乌绰号“小鸟活佛”（藏语即为朱古歧乌。朱古：活佛；歧乌：小鸟）而得名。此画派的流行中心在拉孜和日喀则。这一画派用色强调对比，注意色彩的浓淡变化，习用晕染技法，笔法细腻。在画面组织上起伏自由，主题突出而层次鲜明。此外，西藏民间先后还出现过新勉画派、庆鲁画派、达热画派以及所谓“学院派”等绘画艺术派别¹，在这一阶段的寺院壁画中都遗留下它们的痕迹。

其四，是涌现出一批壁画艺术大师，并且出现了有关宗教绘画（包括寺院壁画）的理论著作，尤其是在元代以后。其中，如13世纪佛教大师、萨迦派五祖之一的贡嘎坚赞以及著名佛教大师布顿等人，不仅具有精深坚实的佛学造诣，同时他们也是绘制壁画的高手。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据称曾在不少寺庙中绘制过壁画。一世班禅克珠杰的壁画作品，至今在拉萨三大寺中还能见到²。一些见诸史载的著名画师如扎喜加波、曼拉顿珠、普库钦则琼布等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此外，民间的绘画大师如布达拉宫白宫壁画的主要执笔者曲英加措、红宫殿堂壁画的主要执笔者加央顿珠以及洛扎丹增罗布、绒巴索朗结布、江央罗布等人，都是17世纪以来著名的绘画艺术大师，创造过不少的壁画作品。

这个时期的许多著作，如拔·塞囊所著《拔协》，巴卧·祖拉陈瓦所著《贤者喜宴》，第巴·桑结嘉措所著《铁锈琉璃》、《贤者养心》，工珠·云丹嘉措所著《知识总汇·工巧源流》等著述中，都论及宗教绘画的理论。著名大师曼拉顿珠的《造像度量如意珠》，更是藏族艺术史上第一部有关宗教绘画的理论专著。

总之，后弘期佛教寺院壁画是从前弘期的始兴、发展到最后走向成熟的阶段。尤其是元、明、清时期，由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联系日益加强，起到了安定社会政治、经济的作用，也促进了西藏宗教文化的发展。西藏寺院壁画现存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阶段的作品，本书所精选出的各个地区、各个教派的寺院壁画，也大多处在这个时代范围内，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西藏藏传佛教寺院壁画艺术的风采，窥见其卓越的成就。

二

西藏佛教寺院壁画的题材是十分广泛的，大体上包括宗教主题和非宗教主题两大类。

宗教主题中常见题材有：（1）佛传及高僧传记图。前者是描写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事迹的图

1 扎雅：《西藏宗教艺术》，谢继胜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0~94页。

2 参见于乃昌著：《西藏审美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6页。



画，藏传佛教中主要包括从兜率天下降、入胎、诞生、学书习定、婚配赛艺、离俗出家、苦行、誓得大菩提、降魔成佛、转法轮、度化其母从天降临、示涅槃等“十二事业”（如图15~24；图191~201）。后者是西藏历史上著名高僧如玛尔巴、米拉日巴等人的生平事迹图。（2）诸佛肖像。包括显、密二宗崇仰的佛、菩萨、佛母、度母、空行母、天王、护法金刚、诸供养天人像等（如图30、32、33、35），以及各教派的高僧大德、活佛像等（如图125、286）。（3）宗教活动图。如描绘辩经、跳神、弘传佛法等活动场面的壁画。（4）宗教建筑图及其他。前者包括幻想中佛徒居住的天庭如西方净土世界，也包括实际的寺院建筑场景；后者还包括六道轮回、礼佛供佛（如图9、29）、佛祖治病，以及一些旨在阐释佛教经义的壁画等。

非宗教主题的壁画常见题材有：（1）历史故事图。主要反映西藏古代历史，如西藏人类的产生、文成公主进藏等内容。（2）人物肖像图。如历代吐蕃赞普、后妃、名臣，历代达赖、班禅系统以及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像等。（3）世俗风情图。包括节日庆典、赛马射箭、行商以及人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内容。（4）含有祝福象征意义的花卉、植物及其他图案，如八吉祥、七珍宝、和睦四兄弟、蒙古伏虎、六长寿图等等。

壁画的配置，常与寺庙建筑的不同宗教功能相互配合，以烘托宗教氛围。在大经堂的主壁上，常绘以释迦牟尼佛像以及佛传、佛本生故事图。四周较低的部位，绘以讲经说法的场面，以供僧人时常观想。在大经堂的门廊两边多绘以四大天王、六道轮回、四瑞祥和图等。在佛堂的两边，则多绘以观音、弥勒、文殊等菩萨像。依怙殿（护法神殿）的壁画多为忿怒金刚一类的护法神，如忿怒马头明王、怖畏金刚等；而医学院的殿堂壁画则多为描写佛祖治病的场面以及病理图、解剖图等。

此外，不同教派的寺院，还常常根据自身的教义绘制本教派或本寺始创人、历代著名高僧大德等壁画于主殿内，亦可绘制与本教派有关的印度寺院、著名僧人等等。但无论何种教派的寺院，释迦、八大菩萨、十六罗汉、四大金刚以及护法诸神，都是必不可少的壁画内容。

西藏佛教寺院除了将壁画绘制于四壁内外，还在寺院殿堂的天花板上，甚至梁、柱之上绘制壁画。天花图案通常是将天花板在铺放之前即先行绘制，然后再铺陈于梁柱之上，砌拼成完整的图案。古格王国遗址殿堂内的天花图案，是迄今为止保存完好、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彩绘艺术作品（图117~121）。

在壁画的构图布局方面，西藏佛教寺院壁画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加以灵活变化。常见的构图方式如：（1）中心式布局。这种布局结构主要见于肖像作品，通常是在画面的中心绘制主尊（佛祖、菩萨、法王、高僧等），其四周围绕以众佛、众神、装饰图案等，突出画面的核心。（2）回环式布局。主要用于表现具有情节性的场面（如历史故事），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将每一片断按照一定的顺次回环往复地安排成“连环画”式的结构，情节分明但又



意义连贯。(3)分格式布局。这一布局方式主要运用于绘制佛传故事,而且主要流行于西部阿里地区的佛寺中。系将佛传故事的每一情节分格绘制、依次编排,通常绘制在佛像的下方,位于壁面的靠下方。

一铺壁画的绘制,往往需要若干道工序。首先,是要粉刷清理墙面,然后根据墙面的高低宽窄确定壁画的位置,画出边框,然后,用炭条、铅笔起草草图,勾画墨线;在线描的基础上,开始敷色,从景物到人物,用干湿两种画法着色,有的壁画还要用沥粉堆金,形成立体的线条;最后,是开眉眼(藏语称之为“坚契”),绘制人物的五官。当壁画绘成之后,还有最后的收尾工作,即在壁面上刷一层胶和清漆,以保护壁画¹。

西藏寺院壁画的用色,总的来讲以红、黄、蓝三原色为主,有时配以白和绿,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而这几种颜料,大多是采用西藏本地的矿物、植物颜料。如用朱砂配成红色,用硫黄和砒霜合成黄色,用一种蓝色的植物制成绿色和蓝色,用一种叫作“嘎日”的白色矿物制成白色。这些原料先研磨成粉,再加以胶水混合稀释,配制成壁画的颜料。这种古老的制作颜料的方法,早在吐蕃时期已经产生。一些早期壁画所使用的颜料,都是这一类矿物、植物颜料。迄今为止,在西藏许多地方还依然制作、使用这类颜料来绘制壁画。除此之外,印度和内地的颜料在近代也输入到西藏,用于壁画绘制。

在西藏高原,佛教寺院壁画的绘制,从来就是一项被视为神圣、崇高、富于智慧创造的技艺,按照传统的观点,在“五明²”之中,有表现工巧技能的“工巧明”,根据不同的技能又划分为“身之工巧”、“语之工巧”和“意之工巧”,分别代表造像制作、语言音乐、宗教知识等不同方面的才能。而壁画的绘制,被列为“身之工巧”的最上等级,足见其受到重视的程度。作为画师本人,也将壁画作品视为神灵的化身和至高无上的艺术品,因为创作壁画的过程同时也体现着他们的修习功德,通过这种善业可达到崇高的境界,所以产生出极大的热诚。正因为如此,可以说西藏寺院壁画比较集中地体现着历代西藏画师在绘画艺术方面的技巧和才能,通过他们的艺术创作实践,也反映出藏族人民的审美意识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从而成为构成中华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参见刘原等《一铺壁画的制作工序》,《西藏科技报》1983年10月16日第四版以及本书《西藏寺院壁画的制作步骤与方法》。

2 五明,是藏族对于人类知识所做的传统上的划分,将其分成五类,称之为“五明”。五明又分为大五明和小五明。大五明包括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分别指工艺学、医学、声律学或梵文语文学、逻辑学、佛教哲学);小五明包括在大五明之内,指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

三

从总体上来看，一切宗教艺术的本质，都是服从于宗教的，西藏壁画当然也不例外。佛教寺院壁画的功用，决定着其形式与内容。

佛教造像绘画的目的，在于供宗教崇拜者修止观瞻，可以简称为“修观”。所谓“修观”，实际上就是用“观”的方法，来断灭造成生死诸苦烦恼的根源，达到“离欲寂静”、“断欲去爱”，超脱于生死轮回之外的涅槃精神境界，这就是“止”、“静心”。如何“修观”，实际上就是学习如何观佛，佛籍中多有论述。如《禅秘要法经》卷中：“佛告阿难：若有比丘……贪淫多者，先教观佛。”《坐禅三昧经》卷上云：“若初习行人，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谛观佛像相好。”《五门禅经要法》云：“若行人有善心已来，未念佛之昧者，教令一心观佛。”西藏历史著作《西藏王统记》中亦记载圣者曼殊师利出白佛言：“世尊在世，凡诸有情，观惟观佛，供惟供佛，积集福田，亦惟依此。”可知西藏佛教壁画的缘起，在宗教意义上也应与“修观”密切相关。

既然佛像是作为修观的对象，便有着极其严格的规范，有着一套固定的制作法式。早在七八世纪，一部古代印度梵语学者阿斋布所著的佛像画理仪轨专著《绘画量度经》（也称为《梵天定书》）已经被介绍到西藏，在拉萨修建大、小昭寺时所绘制的神像，便完全符合于《绘画量度经》中的量度。另据《拔协》一书所载，修建桑耶寺时为寺院绘制神像和壁画，静命大师还专门对工匠宣讲过古代印度的密宗画像规矩。《绘画量度经》和后来的《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以及《佛说造像量度经疏》合称为所谓“三经一疏”，成为西藏佛教艺术的制作标准，不仅在青藏地区广为传布，随着藏传佛教向内地的渗透，在清代还由工布查布将其中的《造像量度经》译成汉文，传入内地，形成较大的影响。

应当看到，由于这些量度的限制，一方面虽然有助于西藏佛教壁画在绘画传统上的保持与传承，并且推动其因有所依凭、便于入门而获得很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束缚着匠师们艺术才能的充分发挥，给匠师们所留下的发挥创造性的余地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西藏佛寺壁画作品，尤其是有关宗教主题的作品，难免给人以某种“千像一面”，比较僵硬、呆板的感觉，庄严凝重有余而变化生动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缺陷。

然而，即便是在这些量度仪轨的严格限制之下，我们仍然可以窥见藏族匠师们冲破沉闷压抑的宗教氛围而迸发出来的灵智的火花。首先，在一些已有固定法式的题材中，匠师们尽可能地在 不违背量度仪轨、符合宗教主题的前提之下，巧妙地对个别画面或局部图案加以设计构思，灵活创造。如阿里古格王国遗址拉康玛波（红殿）中的一幅表现佛“苦修”的佛传故事图，图中菩萨安坐于树下，静心修止，两个顽皮的村童将草棍子插入了菩萨的双耳，菩萨却安然不动，置之不



理。菩萨的坚毅意志与村童的活泼欢娱跃然于画面，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图16）。这种表现方式不见于佛经记载，完全是匠师们根据自己对于经典的理解进行的创造，既合乎于仪轨规范，又增强了画面的艺术感染力，让人叹为观止。

其次，是在具有装饰意味的图案纹饰中，匠师们更是充分地发挥了创造性的才能，驰骋于艺术想象的广阔天地。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也具有潜在的宗教意义，如以花卉、树木、太阳、月亮、星辰一类的天体以及其他一些能使观众产生愉悦的装饰，来抽象地表示神或上师喇嘛心智成就的象征。但是，由于绘画量度仪轨对于这种装饰的细节难以做出详尽的规定和解释，如何在理解和把握这些图案纹饰的宗教意义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每一根线条、每一道笔触、每一组纹饰去加以表现，便取决于匠师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艺术上的造诣深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作为辅助性装饰图案的纹饰，反而恰恰最能体现出匠师们的审美情趣与创造欲、表现力及其形象思维的能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中收进了一批以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壁画中的装饰性图案，通过这些舒展自如的卷草花枝、神采飞扬的珍禽异兽、飘逸漫卷的彩霞流云，使读者能较为全面地对西藏佛寺壁画有所认识。

其三，是在受绘画量度仪轨相对束缚较小的一些非宗教性题材，如历史故事、世俗风情等壁画中，匠师们更多地表现出壁画作品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与现实主义的色彩，突出了其非宗教性价值的一面。如本书中的歌舞庆典（图26）、“协巴协玛”舞蹈（图10）、战争演武（图90、91）、民间往来等壁画，都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是一幅幅珍贵的社会风情画卷。

西藏自从佛教传入以后，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政教合一”的制度，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文化上打上了很深的宗教烙印，佛教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上所述，寺院壁画的主要内容，都是反映宗教主题的，艺术家个人的发挥和创造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透过这层宗教偶像崇拜的雾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匠师们对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对个性的追求。宗教艺术的审美价值，常常并非是由其宗教价值来决定的。在西藏寺院壁画佛教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背后，也有现实主义的成分，蕴藏着古代藏族社会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气质、性格与感情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四

西藏佛教壁画在风格技法上的走向成熟，是与其周边地区佛教壁画艺术不断借鉴、交流、融汇的结果。

随着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传入，西藏早期壁画明显地受到外来的影响。首先，是受到尼泊尔艺术风格的影响。当时由于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为妻，不少尼泊尔艺术家随同赤尊公主一



同进藏，将尼泊尔的绘画艺术带进了西藏。尼泊尔是一个与印度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家，其佛教艺术的突出特点是与印度教之间相互融合。6世纪，唐僧玄奘前往印度时途经尼泊尔，便惊奇地发现在尼泊尔（泥婆罗）的佛教寺庙内，印度教的教徒摩肩接踵，纷至沓来，两种宗教在建筑、造像方面也是非常相似的。无论是佛教还是印度教，都盛行神秘的“怛特罗”（Tantrism）信仰和仪式，即所谓“密咒”。因此，尼泊尔的佛教绘画艺术中，带有浓厚的密乘（金刚乘）特点，如多女性神祇，多出现多头、多臂的护法神以及裸体像等。这个特点，如前所述可能在松赞干布时代的佛寺壁画中就已经有所体现。

其后，以尼泊尔为主体，包括克什米尔、印度在内的所谓“佩孜”绘画风格，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西藏壁画艺术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如壁画多采取分格式（也称为棋盘式）的布局结构，人物造型富于舞蹈姿态，常呈“S”形的三道弯式扭曲，多为丰乳细腰、高鼻深目、袒胸跣足，衣着薄露，带有热带、亚热带特色。在设色运笔上，用色比较单纯，以黑、红为主调，习用晕染法，线条柔长。

西藏现存的佛寺壁画中，以西部及西南部（日喀则以西）的壁画还较多地保留着尼泊尔画风的风格特点（如图275、277、278）。

西藏佛寺壁画还受到来自印度的影响。西藏与南亚印度的文化交流，可能始于7世纪。如果以西部象雄（汉文史籍称之为“羊同”）成为吐蕃属国以前通过泥婆罗（尼泊尔）、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同古代天竺的接触来考虑，那么这种文化上的接触交流可能开始得更早一些。

汉文史籍中明确记载吐蕃与天竺的接触，始于唐贞观年间。由于王玄策出使天竺受阻，遂邀吐蕃、泥婆罗军队“击破中天竺，遣使献捷”（《旧唐书·太宗纪》），促使了吐蕃与印度的交通。据藏籍《贤者喜宴》载，松赞干布时，天竺曾向吐蕃朝贡，“从各自地方献来礼品，以及岁贡，又献很多宝画书信”¹。由此看来，当时可能已有印度的绘画艺术品流入西藏。

8世纪以后，吐蕃与天竺的交往日趋频繁。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进藏以后主持兴建的桑耶寺，据载主要就是依靠来自天竺、泥婆罗和勃律的工匠。寺庙的建筑风格文献也明确记载是依照创建于印度瞿波罗王（约7世纪后期在位）或提婆波罗王（瞿波罗王的后继者，在位48年）时期的“阿旃延那布尼寺（Odantapuri）”的图样设计的²，这已为考古调查所证实³。因而，西藏早期的寺院壁画可能受到印度波罗（pala）王朝时代佛教艺术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西藏更多的是借道于尼泊尔受到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所以，在现存的寺庙壁画中，我

1 参见黄颢：《〈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3页。

2 布顿：《佛教史大宝藏论》，郭和卿译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

3 何周德、索朗旺堆：《桑耶寺简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们已经很难找出印度画风直接影响的证据。只是在西藏西部、西南部的一些寺庙壁画中，还能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如前述萨迦寺中受后期印度密教艺术风格影响的情况。此外，古格壁画中的伎乐天形象，以及一些繁缛华丽的装饰图案，如承柱力士、忍冬卷草以及各种珍禽瑞兽等（图12、13、36等），也透露出印度晚期佛教艺术中所谓“巴洛克风格”、“罗可可风格”影响的痕迹。

内地汉式流派对西藏佛寺壁画艺术的影响也是明显存在的。其最初传入西藏的途径与尼泊尔流派大致相同，也是随着松赞干布迎请唐文成公主进藏一并传入西藏。需要指出的是，汉地佛教艺术本身，在其东渐传播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本民族的风格特点，早期也同样受到希腊—印度艺术和印度笈多艺术风格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一种具有中国汉地传统绘画艺术特征的佛教艺术。反映在壁画绘制方面，这种汉式流派在设色运线上多强调线描，多勾勒、白描与平涂技法，背景中多有似唐代青绿山水的画法，花草树木、山石瀑布，皆富有自然之美。此外，在一些后期佛寺中常见的“四大天王”题材，其绘制方法也多受汉地的影响。

正是在广泛吸取周边地区佛教艺术精华和营养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实践与发展，形成了西藏自身的佛教壁画艺术风格。在现今的西藏宗教壁画中，“无论是纯粹的汉式风格还是纯粹的尼泊尔风格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都已经融入了整个的西藏艺术¹。”这种具有藏族特点的艺术风格一经形成，反过来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与影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双向和互补的文化交流。例如，在敦煌石窟中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848）所开凿的第158、159、220、322等窟，壁画中的画风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出现了吐蕃人的形象和吐蕃的官阶名称。如第220窟内甬道的龕西，出现身着吐蕃衣饰的“信女”，不少洞窟壁画中《维摩诘变》的“问疾品”，绘制有吐蕃赞普及其部众的形象，其衣着服饰与西藏佛寺壁画中的吐蕃人物形象十分相似。元代所开凿的一些洞窟，题材都为密宗的曼荼罗（坛城）及其神祇，装饰图案也用藏文咒语和金刚杵之类的密宗符号组成，画法上还出现了一种画在湿壁上的“水彩壁画”，据考证这种画法具有尼泊尔画风的特点，可能最初是由尼泊尔一带传入西藏，再通过西藏画师带到敦煌²。这些，无疑都反映出西藏壁画艺术对敦煌艺术的影响，是藏族文化对敦煌宝窟的贡献。

元代和清代，西藏佛教艺术不仅进一步影响到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甚至还渗透到祖国内地。在北京、杭州等地都曾经留下来这种影响的痕迹。与西藏邻近的拉达克地区的佛教寺院壁画，根据近年来日本学者实地考察，则几乎完全是西藏壁画的翻版，从内容题材到绘制风格与西

1 扎雅：《西藏宗教艺术》，谢继胜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2 参见张骏：《西藏文化丰富了敦煌宝窟》，《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